

馬 克 思

1848年至1850年的
法蘭西階級鬥爭

第 一 分 冊

人 民 出 版 社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馬 克 思

1848年至1850年的
法兰西阶级斗争

中共中央馬克思 恩格斯
列 宁 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六四年·北京

KARL MARX
DIE KLASSENKÄMPFE IN FRANKREICH
1848 bis 1850

本书正文的译文采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这次排印大十六开本时由译者根据俄文重新校订了一次。“导言”的译文，是在“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所载译文基础上重新校订的。

馬 克 思
1848 年至 1850 年的
法兰西阶级斗争

中共中央馬克思 恩格斯著作編譯局譯
列 寧 斯大林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阳門大街 32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 1 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16}$ · 印张 $11\frac{3}{4}$ · 字数 106,000

1964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64 年 9 月上海第 1 次印刷

統一书号 1001·618 定价（三册共）（五）1.60 元

目 录

导言	1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29
一 1848年的六月失败	30
二 1849年6月13日	63
三 1849年六月十三日事件的后果	106
四 1850年普选权的废除	151
注释	171

导 言

目前再版的这部著作，是馬克思用他的唯物主义观点从一定經濟状况出发來說明一段现代历史的初次尝试。在“共产主义宣言”中，这个理論曾被大体地应用于全部近代历史；在馬克思和我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中，这个理論曾被經常用来解释当时发生的政治事件。可是，这里的问题是要把一个对全欧洲都很紧要同时又很典型的多年历史发展时期中的內在因果联系揭示出来，从而按照作者的观点，把政治事件归结于终究是經濟原因的作用。

在判断当前发生的单个事件或一系列事件时，总是不能探索出**終极的**經濟原因。甚至在今天已有相当的专门报刊提供这样丰富的材料的时候，即使在英国都还没有可能这样逐日地考察工业和世界市场貿易的发展进程以及生产方法中发生的变化，以致能够随时对这些十分复杂和不断变化的因素作出一般的总结，况且，其中最重要的那些因素，在还没有突然猛烈暴露出来以前，大部分都是在长时期內处于潜在活动状态的。对于某一个时期的經濟史的明确观念，决不能和事件本身同时得到，而只

有在事后，即在搜集和鉴别了材料之后才能得到。在这里，统计是必要的辅助手段，而统计总是落在事件后头的。因此，在研究当前的事件时，往往不得不把这个带有决定意义的因素看做是固定的，把有关时期开始时存在的经济状况看做是在整个时期内一成不变的，或者只考虑这个状况中那些从现有的明显事件中产生出来因而同样是十分明显的变化。所以，唯物主义的方法在这里就往往只得局限于把政治冲突归结于由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现有各社会阶级以及各阶级集团的利益的斗争，而把各个政党看做是这些阶级以及阶级集团的多少确切的政治表现。

不言而喻，这种对经济状况（所研究的一切过程的真正基础）中同时发生的种种变化的不可避免的忽略，一定要成为产生错误的泉源。但是，概括叙述当前事变的一切条件都不可避免地包含有产生错误的泉源，然而这并不妨碍任何人去写当前事变的历史。

当马克思着手写这部著作时，要避免上面所说的那种产生错误的泉源更是不可思议的。在1848—1849年的革命时期，要考察同时发生的那些经济变化，或者即使只要把它们保持在视野中，也简直是不可能的。在亡命于伦敦的最初几个月，即在1849—1850年的秋季和冬季，这同样是不可能的。然而马克思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写这部著作的。虽有这些不利的情況，但是，由于马克思精确了解法国在二月革命前夕的经济状况以及这个国

家在二月革命以后的政治历史，所以能对当时的事变作出了这样一个叙述，这个叙述对当时事变的内在联系的揭示达到了至今还无人超越的程度，并且它光辉地经受住了后来由马克思自己进行的两度考验。

第一次考验是这样来的，即从1850年春天起，马克思又有功夫从事经济研究，并且首先着手研究了最近十年的经济史。结果，他从事实中完全弄清楚了他以前半先验地根据远不完备的材料所推出的结论，即：正是1847年的世界贸易危机产生了二月革命和三月革命；从1848年年中起开始逐渐重新到来而在1849年和1850年达到全盛的工业繁荣，是新近加强了欧洲反动派的振奋力量。这是有决定意义的。如果说在头三篇论文中（载于1850年在汉堡出版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1月号、2月号和3月号），还存有期待不久就会有革命力量新高涨到来的心理，那末由马克思和我为1850年秋季出版的最后一期合刊号所写的那篇历史述评（5—10月），就已永远抛弃了这种幻想，那里指出：“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像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①然而这是我们所必须做的唯一重大修改。前几篇论文中对于事变所作的解释，那里所确定的种种因果关系，都绝对没有什么需要改动的地方，这是从上述那篇述评中对1850年3月10日

^① 见本书第155页。——译者注

至秋季的史实續述可以看出的。因此，我就把这篇續述文字当做第四篇論文編入了本版。

第二次考驗还要更为严峻。在路易·波拿巴 1851 年 12 月 2 日举行政变之后，馬克思立刻又重新探討了自 1848 年 2 月起直至这次暂时結束了革命时期的事变止的法国历史（“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1885 年汉堡迈斯納出版社第 3 版）。在这本小册子里，对我们现在重版的这部著作中所考察过的时期又作了分析，不过較為簡略一些。如果把這個参照一年多以后发生的决定性事变做出的第二次記述与第一次記述比較一下，就可看到作者需要改动的地方是很少的。

使这部著作具有特別重大意义的是，在这里第一次提出了世界各国工人政党都一致用以概述自己的經濟改造要求的公式，即：生产資料归社会占有。在第二章中，讲到那里称作“初次概括无产阶级各种革命要求的笨拙公式”的“劳动权”时說道：“但是劳动权实际上是表示控制資本，而控制資本又是表示占有生产資料，使生产資料受联合的工人阶级支配，从而消灭雇佣劳动、資本及其相互間的关系。”^① 这样，这里就第一次表述了一个使现代工人社会主义既与形形色色封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社会主义截然不同，又与空想和自发的工人共产主义所提出的模糊的“财产公有”截然不同的原理。如果

^① 见本书第 73 頁。——譯者注

說馬克思后来把这个公式也推广到交換手段的占有上，那末这种由“共产主义宣言”中自然地引伸出来的推广，不过是从基本原理中得出的結論罢了。最近英国有些聪明人对此还提出了一个补充，說“分配手段”也应该轉归社会。这些先生未必能說明这些不同于生产資料和交換手段的經濟分配手段究竟是些什么东西吧；他們莫不是指**政治的**分配手段，如捐稅、包括薩克森森林²及其他補貼在內的貧民救济嗎？但是，首先，这些分配手段現今已經归社会所有，属于国家或市鎮；其次，这些手段正是我們所想要废除的。

当二月革命爆发时，我們大家关于革命运动的条件和进程的观念，都受过去历史經驗，特別是法国經驗的影响。須知正是法国在1789年以来的全部欧洲历史中起了主要的作用，正是它现在重又发出了普遍变革的信号。因此，我們关于1848年2月在巴黎所宣布的“社会”革命即无产階級革命的性质和进程的观念，帶有回忆1789—1830年榜样的浓厚色彩，这是很自然和不可避免的。而当巴黎起义在維也納、米兰和柏林的胜利起义中获得响应时；当整个欧洲直至俄国边境都被卷入运动时；当后来6月間在巴黎发生无产階級与資产階級彼此爭夺統治的第一次伟大搏斗时；当甚至資产階級的胜利也如此震撼各国資产階級，致使它又重新投入刚被推翻的君主封建

反动势力的怀抱时，——在当时的情势下，我們不可能有絲毫怀疑：伟大的决战已經开始，这个决战定将在一个很长的和充滿变迁的革命时期中进行到底，然而結局只能是无产階級获得最終胜利。

在 1849 年失敗以后，我們並沒有与那些 *in partibus* [在国外]^① 聚集在未来临时政府周围的庸俗民主派抱着相同的幻想。他們指望“人民”很快就会彻底打敗“暴君”，我們却估計到这个“人民”內部所隱藏着的对立成分在鏟除“暴君”后定会彼此进行长久的斗争。庸俗民主派一天又一天地期待新的爆发；我們却早在 1850 年秋季就已宣称，至少革命时期的**第一**阶段已告結束，而在新的世界經濟危机尚未到来以前什么也不会发生。因为这个緣故，我們当时曾被某些人当做革命叛徒革出教門，可是这些人后来只要受到俾斯麦的光顧，就几乎毫无例外地跟俾斯麦和解了。

但是，历史表明我們也曾經錯了，我們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們当时的迷誤，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階級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 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較仔細地加以研究的。

以往的一切革命，都是归結于某一階級的統治由另

^① *in partibus infidelium*——直譯是：“在异教的国家中”。天主教主教被任命为非基督教国家的純粹有名无实的主教时，在其头衔上添有这种字样。——編者注

一階級的統治所替換；但是，以往的一切統治階級，对被統治的人民群众而言，都只是区区少数。这样，一个統治的少数被推翻了，另一个少数又起而掌握国家政权并依照自己的利益改造国家制度。每次这都是在一定的經濟发展状态下能够并且應該进行統治的少数集团，正因为如此，并且也只是因为如此，所以在变革发生时，被統治的多数或者是站在这个少数集团方面参加了变革，或者是安然容忍这个变革。但是，如果把每一个別场合的具体內容撇开不談，那末这一切革命的共同形态就在于：它們都是少数人的革命。多数人即使参加了，他們也只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行动的；然而，正是由于这种情形，或者甚至只是由于多数人采取消极态度，沒有进行抵抗，就造成了一种假象，仿佛这个少数是代表全体人民的。

在第一次巨大的成功以后，胜利的少数照例发生分裂，其中一部分人滿足于已經达到的成就，另一部分人則想繼續前进，提出一些新的要求，这些要求至少有一部分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真正的或想像的利益的。在个別の場合，这些較激进的要求曾見諸实现，不过大部分都只是短时期的，因为較温和的一派重新占得上风，最近取得的成果便又全部或部分地化为烏有；于是战敗者就高叫有人叛变，或者把失敗归咎于偶然。而实际上情形多半是这样：第一次胜利的成果，只是由于較激进的一派取得

第二次胜利才会巩固下来；当这点一經达到，从而使当时必須实现的事情获得实现时，激进派及其成績就又重新从舞台上消失了。

从十七世紀英国大革命起的近代一切革命，都显示了这些似乎是与任何革命斗争分不开的特征。看来，无产阶级争取自己解放的斗争也具有这些特征，何况恰好在1848年，稍微懂得应该循哪个方向去求得这一解放的人还是屈指可数。甚至连巴黎的无产阶级群众本身，在获得胜利后也还完全不明了应该走哪一条路。然而运动终究是已经有了，这是本能的、自发的和不可抑止的运动。难道这不正是革命——虽然是由少数人所领导，但这一次已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是为了多数人的真正利益进行的革命，——一定要获得成功的形势吗？既然在一切稍微长久的革命时期中，广大的人民群众这样容易被那些拼命挤到前面来的少数人用骗人的花言巧语所诱惑，那末他们对于那些最确切地反映他们经济状况的思想，对于那些不外是明确而合理地表达他们自己虽还未理解到、但已经模糊感觉到的要求的思想，难道会更难接受吗？诚然，当幻想一消失而失望袭来的时候，人民群众的这种革命情绪就几乎总是，而且往往是很快地转为厌倦，或者甚至转到相反的方面去。但是，在这里，问题不是在骗人的花言巧语，而是在实现绝大多数人本身的真正利益；诚然，这些利益当时还并没有为这绝大多数人

所認識，但是在其实际实现的过程中，由于具有令人信服的明显性，一定很快就会为这絕大多數人所充分認識的。并且，正如馬克思在第三篇論文中所証明的，1848年“社会”革命中所产生的資產階級共和国的发展，到1850年春季已使实际統治集中于大資產階級——而且是具有保皇主义傾向的大資產階級手中，另一方面，所有其他的社会階級，农民和小資產者，則已團結到无產階級周围，因而在共同胜利时和在共同胜利后，應該成为决定因素的不是他們，而是已經有經驗教訓的无產階級。难道在这些条件下，还不可以完全期望少数人的革命变成多数人的革命嗎？

历史表明，我們以及所有和我們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經濟发展的状况还远沒有成熟到可以鏟除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历史用經濟革命証明了这一点，这个經濟革命自1848年起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初次真正确立了大工业，并且把德国变成了一个真正第一流的工业国，——这一切都是在資本主义的基础上发生的，因此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然而，正是这个工业革命到处都使各階級之間的关系明朗化起来；它排除了从工场手工业时期遺留下来而在东欧甚至是从行会手工业中遺留下来的許多过渡形态，产生了真正的資產階級和真正的大工业无

产阶级，并把它們推到了社会发展的前台。因此，在1848年除英国而外只在巴黎以及某些大工业中心发生的这两大阶级之间的斗争，现在已遍布全欧洲，并且达到了在1848年还难以想像的猛烈程度。在那个时候是各种宗派的許多模模糊糊的福音，其中每一派都有其万应灵丹；现在却是馬克思的一个大家公认的透彻明了的理論，明确地规定了斗争的最終目标。在那个时候是由于地方和民族的特点而分散隔离的群众，他們只是由共同蒙受痛苦的感情联結起来，还不成熟，往往一筹莫展地搖摆于热情与絕望之間；现在却是一支**統一的**国际社会主义者大軍，它所向披靡地前进，它的人数、組織性、紀律性、觉悟程度和胜利信心都在与日俱增。既然連这支强大的无产阶级軍队也还没有达到目的，既然它沒有能够以**一次**决定性的打击取得胜利，而不得不慢慢向前推进，在严酷頑强的斗争中夺取一个一个的陣地，那末这就彻底証明了，在1848年要以一次簡單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

资产阶级分裂成两个王朝保皇集团³，但它要求的首先是它的金融活动所需的平靜和安全；与之相对抗的，是虽被打敗、但仍然威严可畏的无产阶级，小资产者和农民日益聚集在它的周围；經常存在有暴力爆发的威胁，而这种爆发又不能提供任何彻底解决問題的**希望**，——这就是好像专为第三个王位僭望者（冒牌民主主义的王位僭

望者)路易·波拿巴举行政变造成的形势。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借助军队结束了紧张局势,保障了欧洲各国的内部安宁,同时又赐给了它一个新的战争时代。从下面举行革命的时期暂告结束了;跟着来的是从上面举行革命的时期。

1851年的恢复帝国,又一次证明那时无产阶级的意图尚未成熟。但是正是帝国本身必定要造成使无产阶级的意图臻于成熟的条件。内部安宁为新的工业繁荣提供了充分保证;由于需要使军队有事可作,并且由于需要用对外政策问题转移革命意向,结果就产生了战争,而波拿巴就利用这些战争,借口维护“民族原则”⁴,千方百计为法国兼并领土。他的模仿者俾斯麦,也为普鲁士采取了同样的政策;在1866年,他举行了他的政变,即对德意志联邦和奥地利,并对那跟政府发生冲突的普鲁士议会,实行了一个从上面来的革命。可是,欧洲太小,容不下两个波拿巴,于是按照历史的讽刺,俾斯麦推翻了波拿巴,而普鲁士国王威廉则不仅建立了一个小德意志帝国,而且还建立了一个法兰西共和国。然而总的结果则是,欧洲除波兰而外的所有各个大民族的独立自主和内部统一都成了现实;诚然,其疆界是比较狭小的,但是毕竟已宽广到足以使工人阶级的发展进程不再受民族纷争的阻碍了。1848年革命的掘墓人,竟成了它的遗嘱执行者。而在他们旁边则已有1848年革命的继承者威严地站立起

来,这就是以**国际**为代表的无产阶级。

在 1870—1871 年的战争以后,波拿巴从舞台上消失了,而俾斯麦的使命也已经完成,因此他又可以变成一个平庸的容克了。可是,结束这个时期的却是巴黎公社。梯也尔想窃取巴黎国民自卫军大炮的背信弃义的企图,引起了一次胜利的起义。又可以看到,在巴黎,除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以外,任何其他的革命都已是不可能的了。在胜利后,统治就自然而然地、不容争辩地落到了工人阶级手中。又可以看到,甚至在那时,即在本书所考察的那个时期后已经过了二十年的时候,工人阶级的这种统治还是不可能的。一方面,法国让巴黎听天由命,无动于衷地观望着它在麦克马洪的炮弹下流血;另一方面,公社本身分成了布朗基派(多数)和蒲鲁东派(少数),无论哪一派都不知道应该干什么,彼此进行着无谓的斗争,致使公社精力疲惫。1871 年的轻易胜利,也和 1848 年的突然袭击一样,都是没有什么成果的。

人们以为战斗的无产阶级也跟巴黎公社一起被彻底埋葬了。可是,恰恰相反,无产阶级最强有力的进展,是从公社和普法战争的时候开始的。所有适合于服兵役的人之被编入军队,人数达数百万之众的兵士,以及效力空前强大的火器、炮弹和炸药的采用,——这一切在全部军事方面造成了完全的变革,这种变革一方面使得除了空前残酷而结局完全无法逆料的世界战争以外的任何别种战

爭都成为不可能，因而立刻結束了波拿巴的战争时期并且保证了和平的工业发展。另一方面，这个变革使得軍費按照几何級数增长，必然引起捐稅的激增，从而迫使人口中較貧苦的階級投入社会主义的怀抱。亚尔薩斯—洛林的兼并，这个引起疯狂軍备竞争的最近原因，能够煽起法德两国資產階級互相敌对的沙文主义思想，但它对于这两国的工人只是成了一个新的联系环节。而巴黎公社的周年紀念日，則成了全体无产階級的第一个共同节日。

1870—1871 年的战争和公社的失敗，如馬克思所預言的，暫時把欧洲工人运动的重心从法国移到了德国。在法国，要从 1871 年 5 月的流血牺牲中复元过来，自然需要多年的時間。在德国則恰恰相反，工业因获得法国数十亿滋潤補助⁵，簡直像处在温室条件下一样愈益迅速发展起来，因而社会民主党更加迅速和勇往直前地成长起来。由于德国工人善于利用 1866 年实行的普选权，党的惊人的成长就以无可爭辯的数字展现在全世界面前：社会民主党所得的选票在 1871 年为 102 000，1874 年为 352 000，1877 年为 493 000。接着就是当局以反社会党人法的方式来承认了这些成就；党暂时被击败了，所得选票在 1881 年降到了 312 000。但是党很快就克服了这种情况，正是在受非常法压迫、沒有报刊、沒有合法組織、沒有結社集会权利的情形下，才真正开始了迅速的增长：1884 年为 550 000 票，1887 年为 763 000 票，1890